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年(下)

张文宏

内容提要 近30年来,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方法来看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目前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出版了多部社会资本的教材、专著、论文集和译著;在经验研究中,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被结合起来。从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来看:“关系社会学”将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社会网络分析与阶级阶层分析将融合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互联网及其他现代通讯工具中的社会资本与人际社会网络形成互动;社会资本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风险与全球化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关系社会学 定量研究 问卷调查

3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阮丹青等(1990)运用“重要问题讨论网”的提名法收集了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料,她的分析发现,在中国城市中,多数讨论网的成员是亲属和同事,他们之间以密切关系联系起来;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其社会网络规模更大、更多元化,与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的联系更松散;教育与网络规模正向相关;中年人在拥有更多元化的亲属和同事网络中占据着最好的位置;男性拥有更多的同事关系和较少的亲属联系,在建立政治网络中比女性更具有优势。赖蕴宽(Lai 2001)对上海城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进行考察发现,配偶和父母等亲属关系发挥着最重要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功能。同亲属关系相比,同事的支持功能是次要的和更专门化的。在财务支持方面,家庭角色的作用更趋边缘化和专门化。该研

究与阮丹青等研究的发现不同,这可能与两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及其研究设计的不一致有关。

笔者及其同事(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a 1999b)首次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张其仔(1999)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发现,用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去追溯农民的社会支持网仅仅具有部分的适用性。弱关系在农民非就业领域的效力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相反强关系的作用则得到证明。该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弱关系与强关系的作用,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和

制度场景。

蔡禾等(1997)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寻求业缘关系的意向强于郊区农村,寻求血缘关系的意向弱于郊区农村,这种差别在女性中不如男性明显。张文宏、阮丹青(1999, Zhang and Ruan, 2001)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发现,亲属在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亲属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不如其在财务支持网中那么重要,这个倾向在农民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财务支持网中。子女在财务和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都非常小。配偶在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当弱。同事和朋友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比其在财务支持网中更大。在农村,邻居在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两方面均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政治体制、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是否影响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为此,李沛良等(Lee, Ruan, Lai Chan and Peng 2001)对香港和北京城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虽然两个城市的政治制度、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其个人支持网络的构成模式却惊人地类似,具体表现为近亲在提供所有类型的社会支持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近亲的工具性功能强于情感功能。在家庭关系中,配偶在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父母和子女提供工具支持的功能大于情感支持。母亲比父亲、儿子比女儿在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方面更重要。兄弟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而姐妹则提供更重要的情感帮助。近亲中姻亲的支持作用很弱。换言之,血缘亲属比法律亲属的支持功能更强;密友的重要性虽然不及近亲,但是其提供情感支持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远亲、普通朋友、邻居、同事和专业机构的帮助者很少发挥支持作用。朋友的作用是次属的,而且集中于提供情感问题的帮助。这些发现表明核心家庭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在香港华人和北京市民社会支持网络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个城市的主要差别在于,北京市民比香港市民更可能转向同事或邻居寻求

帮助。

赖蕴宽等(Lai and Wong 2002)还运用香港电话调查资料直接分析了通过社会关系的信息传播以及关系特征对于信息获得和传播的影响。她发现,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充当着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但是社会关系也被广泛地使用。个人倾向于与关系密切的人分享信息。通过亲属比通过非亲属或其他沟通渠道能够更快地将信息传播给目标者。

阮丹青(Ruan 2001)对于大陆和台湾个人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发现,亲属在两个华人社会的讨论网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亲属在台湾讨论网中的作用似乎比大陆更重要。在非亲属网络中,大陆发挥重要支持功能的是同事,在台湾则是朋友。个人社会支持网络的类似性与两个社会秉承共同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有关,其差异性则可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结果。

刘军(2006a, 2006b)运用整体网络的视角研究了黑龙江省一个乡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他将法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为四类: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服务和资金支持。在借贷关系中,直系亲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父母比兄弟姐妹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资金支持关系嵌入在亲属网络中;在小宗帮助中,网络成员的互惠指数较大,而在大宗借款支持方面的互惠性较低,但是普遍存在着一种一般性的互惠。在“劳力支持网”和“亲属关系网”中都存在着四个子群。该发现揭示了法村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的整体模式,子群重叠的程度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强度有关。这项研究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一种社会网络意义上的量化验证。在方法论意义上,网络分析中的“块模型”的价值表现在它可以揭示多种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和关系模式,因此可用来研究特别重视“关系”的中国社会。

其他学者则从个体中心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城市居民或某个特殊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范成杰(2006)在对城市居民的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除了受到政治身份、态度、本人职称和母亲职称等因素的影响外,社会网络规模也对调查对象的职业适应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换言之,城市居民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社会能力越强,可以利用的资源越丰富,职业适应水平也就越高。

在对吸毒人员的一项实证研究中,蒋涛(2006)通过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吸毒人员的抽样调查,将被访者的支持网络分为毒品提供、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三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在各个子网络中,毒品提供网络的规模大于经济支持网络,经济支持网络的规模又大于情感支持网络。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通过相识关系获得毒品,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则提供情感和经济方面的支持,亲属关系在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时比朋友发挥的作用更显著。

4 组织网络与组织的社会资本

从组织、群体等中观层面研究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领域。边燕杰、丘海雄(2000)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企业通过纵向和横向联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对广州188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证明,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是形成和扩展企业社会资本的渠道,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对于企业间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和第三产业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产业,该结果证明了结构约束论的效力,即企业只能在经济结构约束的范围内运行。对于企业家能力与社会资本总量关系的分析发现,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这就间接证明了企业家能动性是形成和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

边燕杰(2006)的一项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网络对创业过程至关重要。建立私人企业需要商业情报、创业资金、首份订单,三者缺一不可,而这三项经济资源都深深地嵌入在创业者的个人社会网络之中。深度访谈表明,社会网络中充满了商业信息,而关系人往往也是寻求合作伙伴、筹集资金、拿到订单的前提条件。在创业之初,融资渠道主要依靠社会网络,不仅因为这些投资存在于家庭和社会关系之中,更重要的是因为

获取投资几乎毫无例外地是通过社会关系而运作成功的。企业主与客户之间既有的社会关系是初创企业获得订单的重要来源:既有社会关系为企业与客户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从而使企业可以绕过复杂书面合同的订立过程,节约交易成本;而信任关系的长期维系也可以确保持续得到订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边燕杰和李煜(2000)的另一项研究在家庭社会资本研究的中国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运用定位方法研究了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关系资本。他们把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界定为嵌入在家庭成员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通过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涉取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信息等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调查发现,网络规模大,则网络中亲属关系比例小,网络资本总量高。网络位差大,则网络资源总量就高。另外,网顶高,网络资源总量就大。一个家庭若要提高社会网络资本,必须与地位较高的家庭和个人发展社会交往,同时必须发展非亲属关系,扩大网络规模,并且与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和个人交往。

边燕杰(Bian, 2001)在另一篇论文中研究了宴请在中国城市居民发展和维持人情交换中的作用。他把关系网络分为三种:扩大的家庭义务的网络、特定工具性关系的交换网络和非对称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统计结果揭示,亲属关系在核心网络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但是在宴请网络中的比例却较低,这个发现与扩大的家庭义务和感情的传统模型相悖。在宴请网络中,非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所占的比例也大于其在核心网络中的比例。非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从核心网络到宴请伙伴网络的增长说明,寻找宴请伙伴并不受较大的阶级差异的支配。换言之,工具性的特殊关系模型并不适用,相反,受到较大的网络多元化驱动,不对称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模型得到证实。边燕杰的发现体现在:第一,关系资源更可能嵌入在非家庭关系而不是亲属关系或其他类型的关系中;第二,宴请伙伴倾向于在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的社会阶层内部彼此联系。这意味着中国的关系资源不太可能跨越阶层界限被动员;第三,宴请

伙伴网络比核心网络更多元化,这意味着网络桥梁和关系转让,而不是有形资源的转让是关系资本积累的主要机制。李煜(2001)运用同一调查资料对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他研究发现,一方面,根据“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提出的网顶中介假设基本上得到证实——高层文化资本是通过提高网顶、扩大网差而实现网络资本扩张的。网顶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积聚和扩张并不具有直接作用,而是通过网顶扩大网差,利用提高网顶所带来的更加广泛、丰富的潜在社会关系,结交更多阶层的朋友,从而达到增加网络资源的目的。另一方面,依据“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导出的网络规模中介假设和网差中介假设未被证实。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仅仅存在微弱的直接作用,其对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等结构指标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西方被证实的文化资本多样性理论,在中国的脉络中却不能获得预期的发现,这可能与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呈现出以血缘、姻缘为核心的由亲到疏、由近及远向外延伸的差序格局有关。

徐延辉(2002)从经济社会学比较分析的视角出发,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基于企业家和员工个人品行(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通过企业的社会交换能力表现出来,并以企业为圆心,依据企业可以实现的社会交换的距离和密度划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两部分。她根据社会资本对企业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将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依次分解为企业家个人品行、员工个人品行以及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三个要素。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指企业对外交往以及取得外部资源的能力,包括企业的社会网络和共生契约。企业的社会网络是企业产品的产销过程中与其他贸易伙伴所发生的一些长期性和重复性的社会联系。徐延辉对企业社会资本的重新定义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是这些定义和概念如何在实证研究中转化为可操作的测量指标,恐怕是未来经验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林闽钢(2002)指出网络组织作为企业之间合作与风险共担的交互结构,将日益成为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有力工具。我国组建企业集团过程

中的网络组织的构造,应该成为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这其中又有两个问题应该注意:一是关于企业集团的纽带除了需关注技术依赖、活动互补、分工合作和资本经营等要素外,企业集团的网络治理也是关键。从网络治理结构的综合角度来构造和重组企业集团,是从根本上解决规模不经济问题的关键;二是企业集团的组建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社会环境与产业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将会决定治理结构不同的内涵。

罗家德(2002)运用深入访谈方法从嵌入性的视角研究台湾“关系金融”的四种形式,发现私人借贷是一对一的人际关系,建立在感情连带的基础上。标会是小型、短期和封闭的网状人际关系网络,建立在会员间关系网络的强度与密度上。储蓄互助社是高封闭性、我群意识强的团体,建立在既有团体的内聚力与我群意识之上。信用合作社则是开放而团体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地缘关系人脉连带及团体化过程为基础。这四种融资渠道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紧密相连,因此加强人际关系的强度、密度或团体意识,是使经济功能正常运作的基础。

李明欢(2002)通过对“欧华联会”运作与功能的考察发现,这种跨国的华人华侨社团以追求群体效应,建立群体形象为主,其表达群体意见的目的不在于解决个别成员的具体问题,而是反映该群体的一般诉求,以期得到中国政府及欧盟官方对该群体的重视与支持,期望官方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该群体的利益,其最终的目标是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转化。

5 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 政治参与、关系与信任

近年来,社会学家对“关系和信任”的兴趣越来越大。虽然在社会资本的界定上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多数学者承认关系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

陈健民、丘海雄(1999)运用普特南(Putnam)的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了社团的作用。他们采用“市民社区”的视角,把社团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认为社团的发展有助于建立人际间的沟通与合作,缔造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从而减少在公共

事务和市场上的“搭便车”或利益互损行为,最终对社区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做出贡献。通过对广州市 160 个市级社团的抽样调查,该研究发现社团发展的自主性仍然受到相当的限制,官办、半官办社团是社团的主体,民办社团不足被调查社团的 20%。无论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是在其文化基础上,中国的社团仍然不能称之为市民社区。由于大多数社团处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地位,其独立发展的空间较小,垂直控制和对政府的依赖仍然存在。出于生存需要,社团正被迫走向社会,日渐以会员及社会为本位。因此,研究者建议:中国社团向“市民社区”的发展更需要社会的关怀,政府应该鼓励社团走向自主,并且尊重民办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刘军(2005)从整体网的视角出发,将“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分析单位。他认为,对“关系”的分析往往不同于对“点”的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个体网研究可以进行随机抽样和统计推断不同,整体网的“关系”研究往往不能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得资料,因此,其研究结论不具有“统计推断”的价值。但整体网研究仍具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它适用于研究一个群体内部网络的整体结构,或者说适用于研究小群体。对于“关系”特征的整体网研究,不仅可以获得某种独特网络的“整体”共识和对其典型意义的了解,而且是对个体网研究和属性数据分析结论的有效补充。

胡荣等(2006)分析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城市居民的信任包括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个部分,具体表现为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和密切交往的朋友的特殊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高,对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的一般信任圈子的信任度居中,而对于包括生产商、网友、销售商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低。这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特殊信任远远高于普遍信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影响普遍信任的诸因素中,收入和社团参与因子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多,因而抵御风险的能

力较强,也就更能够承担信任别人可能产生的风险。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优势和中心地位,更懂得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从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够更主动地相信他人。因此,培育更多的横向社团,鼓励市民更多地参与社团活动,是提高社会普遍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

胡荣(2006)还运用普特南的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作者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互惠、信任和规范等几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区认同感越强,村民的参与程度越高,投入村委选举的积极性越高,村民越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村民参与的社团越多,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换言之,在社会资本的各种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和自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农民不仅生活和生产在同一区域,而且社区内简陋的服务设施也主要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来提供,这就使得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远高于城市社区对市民的重要性。对社区认同感较强的村民往往能更积极地参与到基层选举活动中来。

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均提出了质疑。

关系和信任在商业交易中的具体运作机制是怎样的?罗家德等(2006)通过对台湾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深入观察和访谈发现,在商业交易流程的不同阶段会混合使用不同的治理机制。在交易初始的供货商开拓和评估阶段,采用市场竞争和网络口碑与推荐的混合治理方式。在签订采购协

议书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信任使得成本分析变得容易,并且不需要订定太多的惩罚条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不确定性。制度虽然在商业交易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机会主义的产生并有效地维持秩序,而由关系结构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在资源交换和互惠的互动中,则可以起到维持交易秩序、解决资源交换不平衡、使合作关系持续的积极作用。

针对多数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静态结构分析的局限性,有些学者重点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关系、信任的动态构建过程。秦海霞(2006)通过对私营企业主的关系网络构建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在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选择策略和游戏规则。她把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的构建分为四个阶段,即寻找、编织、巩固、发展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主以礼物作为关系建立的媒介,以人情作为社会交换的“货币”,与关系对象编织自己所需的网络模式,再以经济资本的投入作为巩固双方关系的筹码,促使双方依据各自的需求采取相应的策略,做出倾向于对方的决定。通过各种途径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最有力的策略性工具,其结果是社会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全面渗透,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且还重塑了权力关系,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私营企业主之间商业往来的重要机制是“关系”而非“市场”。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市场规则和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被赋予了现代的工具理性的内涵。

6 社会资本的负功能

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主要表现为主流学者忽视了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它漠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和无理性后果;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解释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从而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泛化。应该提醒研究者注意的是,国内媒体和普通大众往往把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正常使用当作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这不仅阻碍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发挥,而且给有关

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可能产生的消极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张文宏,2003)。但是,近几年来,研究者的经验研究中发现了社会资本负功能存在的几种不同形式。

晋军(2001)的质性研究选择了被主流社会学家所忽视的消极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他通过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的一个虚拟个案的分析,围绕交易成本、资本化、外人成本和过度资本化等概念,提出了分析消极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为封闭性,因为特定的稀缺资源被资本化为局外人难以涉取的社会资本,相应地增加了局外人涉取稀缺资源的成本。在此基础上,作者导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如下命题:当一个社会同时具有资源高度稀缺和结构相对封闭的特征时,外人成本将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显著的副产品;将会出现过度资本化的现象。人们对于社会资本的过分依赖,使得多数社会成员必须承担高额的外人成本,最终使个人的社会交易总成本以及相应的群体交易成本大幅增加。

刘林平(2006)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所投入的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费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作用有可能是负面的。从交易费用的逻辑来看,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从微观的角度看,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加了交易费用,对企业的绩效也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

赵延东(2006)在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在寻找再就业岗位时大多使用了社会网络,但得到的工作往往是较“差”的。尽管下岗职工对网络途径的使用极为普遍,但使用网络途径对于再就业的实际作用却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下岗职工求职时如果使用网络途径将更可能获得再就业;另一方面,那些使用了社会网络途径的职工却获得了质量更差的工作。此外,职工的社会资本总量较为贫乏,且多集中于亲戚、朋友的狭小圈子内,这不利于职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因而社会资本的使用不但没

有给下岗职工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尽管他们可能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得新职业，但得到的职业质量却不会太高。该项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负作用”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也同样存在，并且使用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有可能给个人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

也有学者研究了关系与信任在农村社会的地下“六合彩”蔓延中的运作逻辑。邓燕华（2006）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以及不同的交易规则，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笔者认为，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关系信任如果不能在合法和正当的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就有可能在非法领域（如地下“六合彩”的买卖或其他地下经济中）发挥消极的功能。

社会资本研究的特点、问题与未来趋势

（一）特点

纵观过去 30 年中国学界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

1 研究领域有所扩展、分析层次呈多元化、提名法和定位法的测量技术开始结合起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和统计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已经初见端倪，这说明发轫于社会结构视角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正在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在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几乎涉及所有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领域，诸如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社会支持网、组织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区、老年群体、弱势群体等。分析层次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微观层次，以家庭、企业、社团等群体或组织作为分析单位的中观层次上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研究设计中的提名法和定位法开始在某些研究中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方法论特点的跨学科领域。

2 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正在走

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其标志是开设专业课程、培养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召开专业会议、拥有专业化的学术团体。一些重点大学的社会学系（如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已经陆续开设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关系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课程。2006 年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首次设立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业论坛。自 2005 年开始，先后召开了五届“社会网与关系管理”学术研讨会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高层次专业培训班。一些社会学核心期刊（如《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几乎每期都刊发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论文。甚至有期刊组织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题（如《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2 期）。作为专业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社会学学会社会网络专业委员会在筹备 5 年之后于 2009 年 10 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第五届“社会网与关系管理”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

3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业教材、专著、论文集、译著陆续出版，引进吸收的任务基本完成。如《社会网分析讲义》（罗家德，2004）、《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刘军，2004）、《法村社会支持网络》（刘军，2006）、《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张文宏，2006b）、《社会资本与管理学》（郭毅、罗家德，2007）等。这些著作系统介绍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自我中心网络和个体中心网络资料的收集方法，重点评述了整体网络研究中的小团体、中心性、角色和网络动态性等分析模型，将社会网络分析看作是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艺术和技术，全面分析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结合专业软件 UCINET 的使用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中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测量方法。

4 量化研究和质性分析的成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西方的社会资本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理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研究假设验证的定量分析，这种主流倾向可以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业期刊 Social Networks 中发现。纵观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除了定量研究成果外，以个案研究、田

野调查和深入的访谈资料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定量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为推动社会资本研究在国内的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研究者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收集“关系”实践的资料,因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社会。

(二)问题

尽管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已经成为最近几年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1 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由此导致了测量的混乱和对于同一结果的迥异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宽泛化和随意化,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力。在一种测量层次上得出的结论,却与在其他分析层次上的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和讨论。将在个案研究、田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普遍的意义,以致陷入了区位谬误的泥潭。

2 部分研究者在“隐喻”而非“实质”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等概念,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

3 目前还没有设计出类似美国“讨论网”那样获得公认的提名法,来综合地描述中国人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特征。虽然学者们尝试着使用“讨论网”、“拜年网”、“餐饮网”、“求职网”等来测量中国人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无论是在提名法还是定位法的操作化测量中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获得高度认同的测量方式。

4 本土化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矛盾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三)未来趋势

结合当前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学者的研究兴趣、专长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以下几个方面有可能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

1 关系社会学有可能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

正如边燕杰在 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的主题报告中所指出的,研究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以及对这个现象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许是探索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念、中国社会学学科方向以及社会学的中国学术流派形成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关系社会学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为特征的关系主义现象的理论知识;在方法论层面上,关系社会学是探索和分析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思维方法论、研究方法论,即从关系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社会学是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及其变动的重要学术工具。不但在传统中国社会,而且在我们生活其间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关系主义都是调节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键机制。为此,关系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社会变迁,是处于中心学术地位的。关系社会学将是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有了关系社会学,我们就多了一个直接反映中国社会、中国本土文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就有了一个新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从而更好地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目标。关系社会学将是我们开展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新的阶梯和渠道。因此,笔者认为,如何借用西方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概念、测量方法,创建国内外社会学者都能认同的关系社会学学科体系,推动中国关系社会学的国际化,增强对中国社会及国际社会中心关系现象的解释力,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同行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2 在研究范式上,阶级阶层分析视角和社会网络分析视野渐趋融合。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范式,阶级阶层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共性是研究人们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只不过前者更偏重分析社会成员在科层制组织中的正式位置,后者更关注社会成员在非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两种研究范式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关系。因此,将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模型和测量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和分析技术结合起来

分析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状况, 不论对于阶级阶层理论的发展, 还是对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完善的贡献(张文宏, 2006b)。

3 互联网及其他现代通讯工具中的社会资本与人际社会网络形成互动。据工业和信息产业部统计, 截至 2009 年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3.84 亿人, 较 2008 年增长 28.9%, 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 22.6% 提升到 28.9%, 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手机用户达到 7.47 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约为 2.33 亿, 占网民总体的 60.8%。其中发挥交通沟通功能的即时通信、博客应用、电子邮件、社交网站、论坛/BBS 的使用率分别达到 70.9%、57.7%、56.8%、45.8% 和 30.5%。不可否认, 互联网目前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收集信息、交往、工作、娱乐和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换言之, 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作为一种关系和嵌入性资源, 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工作和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社会资本的积聚平台。因此, 未来的研究将重点分析计算机网络是如何建立和分割社会资本、虚拟社会组织和团体形成的参与机制、虚拟社会成员的社会人口特征、网上互动和资源交换的模式、虚拟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网络社会资本与现实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和差异性等问题。

4 社会资本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整合与协调手段。以往的经验研究证明了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可以发挥信息搜寻和传播、施加社会影响、提供社会信用和社会支持、增强团体和组织的团结和凝聚力、促进社区参与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等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积极作用。那么,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社会资本能否作为等级制调控和市场调节之外的第三种方式, 作为一种社会整合与协调手段, 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组织之间、政府、市场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谐? 社会资本能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其发挥整合与协调功能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是否会带来负面的效应? 这些问题均需要社会学者去展开研究。

5 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结构与

功能发生变迁。中国加入 WTO 以来, 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在全球化背景下, 大量的国际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纷纷抢滩中国大陆, 这种国际有形资本的加速流动, 也必然带动国际和国内社会资本的结构重塑和功能转型。分析全球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趋势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中国报告 2009: 民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中国报告 2010: 民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2 边燕杰:《找回强关系: 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学》1998 年第 2 期;《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 载林益民、涂肇庆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 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10 ~ 138 页;《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社会资本研究》《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2 期;《企业脱生: 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6 期; 洪涛:《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网络和职业流动》,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学》1999 年第 4 期; 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 《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2 期; 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 年特辑第 2 期; 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 Ronald Breiger Deborah Davis Joseph Galaskiewicz《中国城市的职业、阶层和关系网》, 《开放时代》2005 年第 4 期。
- 3 蔡禾等:《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 《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 6 期。
- 4 曹子玮:《职业获得与关系结构——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的几个问题》, 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庄——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71 ~ 94 页。
- 5 陈健民、丘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 6 邓燕华:《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 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 《社会》2006 年第 1 期。
- 7 范·德·普尔:《个人支持网概述》,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学》1994 年第 4 期。
- 8 范成杰:《城市居民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社会》2006 年第 1 期。
- 9 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学》1998 年第 2 期。
- 10 郭毅、罗罗德:《社会资本与管理学》,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1.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6期。
12. 蒋涛:《吸毒人群社会支持网研究——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的调查》《社会》2006年第4期。
13. 廖文伟、王丽云:《寻找工作与寻找员工:将雇主引入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分析》《社会》2005年第2期。
14. 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5. 李明欢:《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欧华联合”的运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6.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梁栋:《网络化:企业组织变化的新趋势——北京中关村2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17. 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元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8. 林聚任、刘翠霞:《山东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调查》《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19. 林南:《社会资本:争鸣的范式和实证的检验》《香港社会学学报》2001年第2期;《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2期;塞尔·韦恩:《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力量》,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20. 林闽钢:《社会学视野中的组织间网络及其治理结构》《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21. 刘军:《关系:一种新的分析单位》《社会》2005年第5期;《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法村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研究:块模型及其应用》《社会》2006年第3期。
22. 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兼评边燕杰、丘海雄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3. 罗家德:《人际关系连带、信任与关系金融:以嵌入性观点研究台湾民间借贷》《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特辑第2期;《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赵延东:《社会资本的层次及其测量方法》,李培林、覃方明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叶勇助:《信任在外包交易治理中的作用》《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
24. 麦克弗森、博派拉兹、德罗尼克:《社会网络和组织动力》,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1994年第4期。
25. 秦海霞:《关系网络的建构: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逻辑——以辽宁省D市为个案》《社会》2006年第5期。
26. 丘海雄等:《社会支持结构的改变:从一元到多元》《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27. 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庄——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28. 阮丹青等:《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29. 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0. 王汉生、陈智霞:《再就业政策与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31. 韦尔曼:《网络分析的基本原理》,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6期;《网络分析:从方法和隐喻到理论和实质》,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1994年第4期。
32. 肖鸿(张文宏):《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3. 徐延辉:《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34. 亚马吉斯、基尔莫、库克:《交换网络中的网络联系和权力分布》,张文宏译,《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35. 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谈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36. 张其仔:《社会网与基层社会生活——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7. 张文宏:《从农村微观社会网的变化看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中国农村的微观社会网与宏观社会结构》《浙江学刊》1999年第5期;《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性质的影响》《社会》2005年第4期;《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社会》2006年第6期;《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沛良、阮丹青:《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38. 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5社会学研究62002年第4期;5求职者的社会网络与就业保留工资6,5社会学研究62003年第4期;5再就业中社会资本的使用)))以武汉市下岗职工为例6,5学习与探索62006年第2期;Jon Pederson 5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6,5社会62007年第2期。
39.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40. 周玉:5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6,5社会62006

年第 1 期。

41 朱国宏: 5 经济社会学 6,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2 朱旭峰: 5 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 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分析 6, 5 社会学研究 6 2006 年第 4 期。

43 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 266 ~ 285 /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in Chinese Cit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2001, pp. 275 ~ 296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Nan Lin, Karen Cook and Ronald S. Burt. Aline De Gruyter New York / Institutional Holes and Job Mobility Processes: Guanxi Mechanisms in China's Emergent Labor Market, 2002, pp. 117 ~ 136 in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al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edited by Thomas Gold, Doug Guthrie and David Wan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 Burt Ronald S /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1984, 6: 293 ~ 339.

45 Granovetter Mark. /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

46 Lai Gina /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Urban Shanghai, Social Networks 2001, 23.

47 Lai Gina and Odalia Wong / The Tie Effect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Spread of a Commercial Rumor in Hong Kong, Social Networks 2002, 24.

48 Lee Rance P. L., Danching Ruan, Gina Lai, Ying Keung Chan and Yusheng Peng / Composition of Support Networks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2001, Budapest, Hungary.

49. Lin, Nan /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1999, 22(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 46: 393 ~ 405.

50 Marsden, Peter V. /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52: 122 ~ 131.

51 Ruan, Danching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ersonal Networks in Two Chinese Societies, 2001, pp. 189 ~ 206 in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es, edited by Alvin Y.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52 Wellman, Barry /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1988, pp. 19 ~ 61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ited by Barry Wellman and S. D. Berkowi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3 Zhang Wenhong and Danching Ruan /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China: an Urban - Rural Comparis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1, 2.

作者简介: 张文宏, 1963 年生,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 责任编辑: 丁惠平 2